

後繼有人——《金文編》終於出版

趙 誠

容庚先生撰集的《金文編》是一部金文字典，初版於1925年。它問世後，曾給金文的教學研究者帶來了相當大的方便。後來，隨着銅器出土的日益增多，隨着考釋工作的日益發展，本書在1939年再版、1959年三版時都有所增補。第三版問世之後，容先生每見到新的銅器銘文，即將新字逐一補入。即使在十年動亂身處逆境之時，他也從未停止過這項工作。到了1977、1978年間，容先生鑒於年邁有病，遂將修訂增補工作交給學生馬國權先生繼續進行。後來，馬先生調離中山大學，容先生又交給另一學生張振林先生繼續蒐集摹寫。1983年初，容先生不幸去世。由於後繼有人，《金文編》這一大型工具書的編纂工作並未因此中斷，而於1984年中完成，1985年秋由中華書局出版。

任何一門科學，在編纂本學科的專業工具書時，必然要吸收該學科在前一段時期的研究成果，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該學科當時的學術水平。《金文編》編纂、修訂、增補的歷史過程，也說明了這一點。從宋代開始有所謂彝器款識之學，曾出版呂大臨《考古圖》、王黼等《博古圖錄》、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厚之《鐘鼎款識》、王休《嘯堂集古錄》等著錄銅器銘文以及釋讀金文文字的專書。到了清代，尤其是清代中後期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後，經過阮元、曹載奎、吳榮光、吳云、潘祖蔭、吳式芬、吳大澂、劉心源、孫治讓、端方、羅振玉、鄒安、王國維等人的努力，出版了多種著錄銅器銘文和金文文字考釋的專著和論文，彝器款識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十九世紀中後期，由於照相技術運用於書籍印制，銅器銘文的著錄由摹刻發展為影印，這不僅加速了銘文的著錄出版，也使研究者能夠目驗傳真的金文文字而使研究逐步深入。《金文編》於1920年前後着手摹錄編寫，經修改，定稿於1924年，大體上就是反映了由宋到清、到辛亥革命之後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和學術水平。1925年出版的第一版，收錄的殷周銅器僅1535件（此為器目後記載之統計數。《自序》中所記者則為1534件），而所出金文字頭却有1382個。這一事實說明，當時已經公諸於世的銅器銘文並不多，而常用的金文文字已被人們認識了不少。這應該說是近一千年來金文研究的主要成果。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由於羅振玉、王國維、容庚、郭沫若、于省吾、徐中舒、唐蘭、吳其昌等人的努力，一大批銅器銘文的精善拓本影印問世，從各種角度對金文進行研究的論文和專著相繼刊印出版，使我國青銅器和金文的研究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這個時期著錄銅器銘文的專書以羅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為代表，其特點是拓

本精良、鑑別嚴格、原大影印、盡量求全，全書所收的四千八百多器大多為精品。《金文編》第二版能夠增收那麼多器目，能夠將原來所收的偽器，一一刪去，基本上就是依靠了這一類著錄專書。縱觀這一時期金文研究的特點，大體有這樣幾個方面：一、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考証文字的嚴謹求實之風；二、吸收了近代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三、開始提倡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等先進的觀點進行研究。所以，這一段時期年代不長而成果較多。《金文編》第二版定稿於1938年，出版於1939年，共收金文字頭1804個，比起初版的1382個，增多了422個，就充分反映了這短短的十四年裏金文的研究有着長足的發展。

三十年代後期爆發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緊接着又是連續三年的解放戰爭。十多年來，人們奔波於戰火硝煙之下，生活既不安定，經濟又異常窘迫，談不上什麼系統深入的金文研究。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在廢墟上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園，百廢待舉，的確需要一段時期，幫助疲備不堪的人們定一定心緒，恢復精神。在這樣的形勢下，金文研究在某些方面如果還有什麼研究的話，也只能是零零星星的個別現象。1954——1956年，新中國經過了恢復時期進入了黃金時代，人們的政治生活安定，經濟生活繁榮，精神生活振奮，金文研究也開始有了轉機，一些著錄新出土銅器銘文和從不同角度研究金文的專著和論文相繼問世。如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丁山《殷商氏族方國志》、安徽省文管會《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安徽省博物館《楚器圖錄》等等陸續出版。概而言之，從1939到1959年，雖然經過了二十年之久，但出土的銅器公佈不多，學者們的金文研究也不夠深入，成果當然就較少。《金文編》第三版的修訂增補，定稿於1957年，出版於1959年。全書收金文字頭1894個，比第二版的1804個，僅增加了九十個，大體上是這一段時期金文研究面貌的寫照。

1961年以後，經過了幾年的恢復，我國在各方面都開始有了新的發展。傳世的或新出土的銅器，包括流失到國外的銅器資料，又陸續整理出版，研究工作也開始逐步走上正規。可是，1966年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動亂，整理和研究工作又基本上停頓了下來。一直到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之後，才開始逐步恢復。真正的發展則是在三中全會之後。在那些日子裏，整個學術界象一鍋沸沸揚揚的開水，熱氣騰騰，蒸蒸日上，又象滾滾東流的長江，洶湧澎湃，奔騰而前。不管是年已古稀的老專家，還是正當青年的學者，或是剛參加工作不久的青年，都在為新出土青銅器的整理、著錄全力以赴，並圍繞着一些重要銅器的出土如《利簋》、中山王銅器、《牆盤》、曾侯乙編鐘等等展開了一個又一個的討論，討論既深入又持久，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因之金文文字考釋也就成果斐然。就在這樣的形勢之下，《金文編》完成了第四版的修訂增補工作，所以，新增的器目多至737器，即由第三版的3165器增加到第四版的3902器；增補的字頭多至526個，即由第三版的1894字增補到第四版的2420字。只要稍加比較，就能清楚地看到，取得這樣好的成績的確是空前的。可以說是我們祖國的現代化建設已經展現了光輝燦爛的前景、經濟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在學術文化事業上的一種反映。

如果僅從統計數字來看，《金文編》第四版正編的字頭比第三版增加了526個。其

實並不只此：一、第三版正編原有的某些字頭，到了第四版進行了合併，如祝（三版第24號）和祝（三版第28號）合併為祝（四版第27號）；二、第三版正編原有的某些字頭到了第四版並未收入，如趨（三版第156號）字，實際上是刪去了。合併的和刪去的加在一起，共減少了字頭41個，則第四版正編實際上增加的字頭是526加41，共是567個。

除了合併和刪去，還改變了某些字頭，如𠄎（三版437號）改為徹（四版505號）、佗（三版224號）改為𠄎（四版280號）、𠄎（三版574號）改為解（四版705號）、𠄎（三版600號）改為𠄎（四版740號）、𠄎（三版871號）改為𠄎（四版1072號）、𠄎（三版902號）改為𠄎（四版1115號）、𠄎（三版1025號）改為𠄎（四版1265號）、𠄎（三版1103號）改為𠄎（四版1412號）、𠄎（三版1166號）改為𠄎（四版1438號）、𠄎（三版1437號）改為𠄎（四版1838號）、𠄎（三版1442號）改為𠄎（四版1848號）、𠄎（三版1576號）改為媚（四版1976號）、𠄎（三版1582號）改為𠄎（四版2010號）、弘（三版1640號）改為引（四版2084號）、𠄎（三版1732號）改為𠄎（四版2208號）等等。

《金文編》第四版在吸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的增補、合併、刪去、修改字頭，只是修訂增補的一個重要方面。除此而外，作者還作了大量的工作：

一、《金文編》第四版雖然是修訂增補本，但却重新摹寫一過，比第三版有了較大的改進：1. 第三版所收金文例字，有的由於兩字之間靠得太近，不易分清字與字之間的界限，給人一種模糊的感覺；重摹之後，兩字之間有了一定距離，給人一種清晰感，睽字所收各字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請將第三版第462號和第四版576號加以對比）。2. 第三版所收各字下的說明，包括釋文、器名、註解等等，均用恭整的草書書寫，一般的讀者看起來比較吃力。第四版統統改為小楷書寫，看起來醒目、清楚。的確是一大改進。

二、第四版增加了一些必要的註解和說明：1. 關於文字構形之註解，如上字下註曰：《說文》段氏《注》云：“古文上作二。故帝下旁下示下皆云從古文二。可以證古文本作二”（四版第7號）。2. 關於詞義之註釋，如會字下註曰：《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東面坐啓會”《注》：“簋蓋也”（四版第858號）。3. 關於古今文字關係之註釋，如佳字下註曰：《說文》：“鳥之短尾總名也。”段玉裁云：“按經傳多用為發語之詞。《毛詩》皆作維。《尚書》皆作惟。今文《尚書》皆作維。”（四版598號）4. 關於史實之註釋，如𠄎字下曰：國名。媯姓。侯爵。帝舜裔。武王以其元女嫁其裔孫滿而封之陳，以奉虞祀。後為楚所滅（四版523號）。5. 引用銘文辭語作為注釋，如宅字下引《何尊》辭語“佳王初郟宅於成周”，及“余其宅茲中或”（四版1183號）。這一些注釋雖然不多，却對讀者極為方便。

三、字頭和例字的關係有所改變，如第三版1750號鎬字下原列有兩類字形，一為𠄎形字；一為鎬形字。並於𠄎形字下注云：從𠄎從𠄎。武王所都。《詩·文王有聲》：“宅是鎬京”。又作郟，《荀子·王霸篇》：“武王以郟”。又作鎬，《荀子·議兵篇》：“武王以鎬”。很顯然，把𠄎也當作鎬。第四版2232號鎬字下只列鎬形字。把𠄎形字分離出來，另出一個字頭𠄎，作為與鎬不同的另一個字。並把原來的注解統統刪去，

另外注明“說文所無”。可見第四版不僅增加注釋，也刪去某些注解（原文被刪去者還有不少，此從略）。例字改變的還有另外一些情況，如第三版 929 號鼎字下所列的某些例字在第四版改列於鼎字之下（四版 1146 號），而鼎、鼎兩個字頭仍然保留。

四、《金文編》的金文字頭均依《說文》收字之次序排列。凡《說文》所無之字皆附於相應的部首之後。隨着考釋工作的發展，某些字的釋讀或對某些字形體結構的分析都有所改變，這些字排列的地位也相應地有所改變。如第三版的𠄎字（1103 號）本次於人部之後，第四版改釋為𠄎字（1412 號）也就改列於尸部之後。又如第三版的𠄎字（374 號），原以為從又，故列於又部之後。第四版認為應是𠄎字，當從受，故列於受部之後。很清楚，這一些並不是簡單的排列次序的改變，而是根據對金文原字的辨識和考証加以審慎考慮的結果。

五、銅器器名基本上是研究者根據銅器銘文的內容、主要作器人的名字而確定的。由於研究的不斷深入，對某些銘文內容以及作器之人的看法有時會有所改變，其器名也就隨之而有所改變。這也是金文研究成果的一個方面。《金文編》第四版在這方面也有所反映，如第三版的《禹刊王壺》第四版改作《趙孟壺》，第三版的《齊候壺》第四版改作《洹子孟姜壺》，第三版的《大豐簋》第四版改作《天亡簋》等等。

《金文編》第四版做了大量的修訂增補工作，成績突出，但也存在某些不足之處。如第三版 617 號壺字下有一小注作“孳乳為鼓”，是對的，第四版重寫時寫作“孳乳為彭”（759 號），“鼓”字誤成了“彭”，顯然不妥。

總說起來，《金文編》第四版的問世，對金文研究必將產生相當的影響，其貢獻將隨着時間的發展而日益顯現。